

# 抒情傳統與現代—— 黃仲則詩在民國

葉倬瑋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師

## 摘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清代詩人黃仲則得到文學研究者的熱切關注，相關文章多不勝數。本文透過比對清代和民國時期對黃仲則的論說，指出民國的黃仲則研究焦點與清人不同，而這個熱潮與新文學建設的學術背景又有密切關係。郁達夫、章衣萍等人的書寫，奠定了黃仲則研究的新路向，踵武者嗣響不絕。這些書寫發掘、提煉黃仲則的戀愛故事，以抒情為書寫基點，突破了文體、語言形式的限制，回應了五四以來文學革命背景下，文學研究者對文學的新要求。

**關鍵詞：**黃仲則 章衣萍 綺艷詩 抒情傳統 文學革命

# 抒情傳統與現代—— 黃仲則詩在民國

葉倬瑋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師

## 一、引言<sup>①</sup>

上世紀初，中國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1912 年封建帝制被推翻。隨之而來的文學革命，揚棄舊體文學、文言的枷鎖，開拓新文學、白話的書寫，文學成為了知識份子爭鳴的重要場域。1917 年，胡適於《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sup>②</sup>，提出言文合一、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等觀點，並對傳統文學之形式（特別是用典）進行了鞭撻。胡適之論得到了陳獨秀、魯迅等人的呼應，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歌、散文、小說，甚至學術論文大量出現，新文學（或白話文學）地位正式確立。如果我們觀察舊體文學在文學革命後的發展，以及古代詩人、詩論在這時期的出現形態及書寫方式，或許會對新文學的理論建設有更深入的體會。

本文研究清代詩人黃仲則在民國時期的接受狀況，將作如下的分析：(1)概括清人對黃仲則的評論方向，觀察黃仲則愛情故事的書寫狀況；(2)說明民國時期對黃仲則戀愛故事的發掘，分析其書寫策略，指出此時期研究方向與清人之分別；(3)分析此時期的「黃仲則」書寫如何反思中國文學傳統，及其與新文學建設的關係。

---

① 本論文審稿時得兩位匿名評審惠賜意見，對本文之修改完成功勞至大，謹致謝忱。

②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 2 卷第 5 號（1917 年），頁 1-11。

黃景仁（1749-1783），字漢鏞，一字仲則，號鹿菲子，陽湖人（今江蘇省常州市）。清代乾隆時期著名詩人，一生窮困，僅 27 歲時授武英殿書籤官，34 歲時為債家所逼，抱病赴陝西投靠畢沅，未至而病逝於河東鹽運使沈業富官署中。黃仲則有《兩當軒集》，有詩詞創作約二千首，黃仲則之孫黃志述於咸豐年間刻《兩當軒全集》，後來此版毀於太平天國戰火，黃志述妻吳氏花十餘年時間，於光緒二年（1876 年）重刻，收詩 1170 首，詞 216 首，文 6 篇，成為坊間通行的版本。1983 年，李國章標點的《兩當軒集》，補收了漏刻的詩 8 首，增《酬唱集》二卷，另增三篇佚作於補遺，成為至今最齊全的黃仲則詩詞集版本。<sup>③</sup>

## 二、翁方綱《悔存詩鈔》與清人的黃仲則書寫

翁方綱編選的《悔存詩鈔》是黃仲則詩集的第一個刻本，也是第一部選本，清代讀到的人很多，回應此選本的意見亦不少。筆者認為，翁氏選本很凝鍊地體現了編選者欲創造的黃仲則形象，而這種形象與黃仲則本人、清代讀者對黃仲則的理解和想像有距離；有關黃仲則的評價，亦往往為了回應該選本之「不實」而提出。故此，通過翁氏選本，我們可以概括而準確地了解清人對黃仲則的印象。當我們執此選本和印象，來與民國時期的黃仲則書寫作比較時，就可以發現黃仲則形象的繼承與轉化，其作品的經典化過程等，故本文以此作為後文論述之基礎。

翁方綱（1733-1818），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於考據、經學、金石、文學皆有建樹。他著作等身，論詩主肌理，與文學相關的編著有《復初齋文集》、《復初齋詩集》、《杜詩附記》、《蘇詩補注》、《小石帆亭著錄》、《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石洲詩話》、《悔存詩鈔》等。黃仲則到北京時，曾和翁方綱、蔣士詮等人來往，結「都門詩社」。翁方綱很欣賞黃仲則，認為他得到先祖

<sup>③</sup> 有關黃仲則作品的流傳，及詩文集的刻印情況，請參李國章於《兩當軒集》的〈前言〉，黃景仁撰，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9；魏仲佑：《黃景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7 年），頁 4-18；張文飛：〈關於黃景仁作品的版本〉，載《社會科學家》2007 年 11 月增刊，頁 223-224。

黃庭堅真傳。黃仲則去世後第二年，洪亮吉準備將其詩文集刻印出版，翁方綱特意致書阻止，認為黃詩必須「嚴刪」，然後可傳，該集最終沒有出版。原來，翁方綱已經編選了《悔存詩鈔》八卷，收詩約五百首，並於嘉慶元年（1796）由劉大觀刻成出版。該選本的序撰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十一月，其時為黃仲則死後半年，序云：

世徒見才士多困躓不遇，因益以其詩堅之，而彼才士之自堅也益甚，於是怨尤之習生，而蕩僻之志作矣。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為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sup>④</sup>

又云：

然而其詩尚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雲而泣鬼神，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間，江山相對，此人猶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稚存評其詩出於太白，然此或人多知之者，吾是以不具論。<sup>⑤</sup>

引文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以下是從翁方綱序文「整理」出來的黃仲則形象：

1. 困躓不遇——遭遇
2. 天性高曠——性情
3. 讀書心眼，穿穴古人——才情
4. 凌厲奇矯，不主故常——詩風

④ 翁方綱：〈序〉，黃景仁撰，翁方綱選：《悔存詩鈔》，四庫未收書輯刊拾輯，第2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226。

⑤ 同前註。

5. 放浪酣嬉——詩風

6. 沈鬱清壯——詩風

7. 其詩出於太白——詩歌淵源

翁方綱雖然對「窮而後工」、「放浪酣嬉」有所保留，並故意不選黃仲則「放浪酣嬉」的詩歌，認為「非其本懷」；但如此卻無法掩藏黃仲則有不少「放浪酣嬉」詩作的事實。以翁氏選本比對另一流行選集王昶《湖海詩傳》所選之詩，及洪亮吉、袁枚等人的詩評，可以得出較為清人傳頌的作品，有〈觀潮行〉、〈後觀潮行〉、〈圈虎行〉、〈都門秋思〉、〈癸巳除夕偶成〉、〈雜感〉、〈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綺懷〉等篇。當中，翁氏選本並沒有選入〈圈虎行〉和〈綺懷〉。〈圈虎行〉借虎喻有才之士，任人頤使，使詩人氣沮，頗有憤世疾俗之感；〈綺懷〉有十六首，追憶少年時與情人相戀之往事，是相當纏綿綺麗的組詩。翁氏論詩喜歌頌皇清盛世「文物之光」，又以杜詩為典範，這種憤世疾俗的，或綺麗纏綿之詩，當然難入他的法眼，故「刪之又刪」。然而，就筆者所見，像〈圈虎行〉這種諷時傷己之作，黃仲則集中其實極少。清人評此詩又多從七古寫法上置論<sup>⑥</sup>，對詩中所諷之對象沒有太多關注。故此，我們並不能從清人評論中歸結出「黃仲則關心時政」之類的判斷。綺麗詩則不同，黃氏集中載有不少，如〈感舊〉、〈秋夕〉、〈雜感四首〉、〈綺懷〉等，清人認為黃仲則好酒色者亦不乏人<sup>⑦</sup>，故這應為清人論述裡黃仲則形象的重要部份。除了這兩類詩外，翁本所選的都很有到，頗能代表黃氏其人其詩。故此，將翁本之黃仲則，加上被刪去的綺麗之作（洪亮吉有詩云「刪除花月少精神」），可以總結清人論述裡黃

⑥ 如孫星衍《詩評》：「仲則《圈虎行》為七古絕技，『似張虎威實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轉引自黃葆樹、陳弼、章谷編：《黃仲則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29。

⑦ 如張維屏：「或曰：『仲則耽酒好色，其才雖美，其人不足重。子之推許，毋乃過歟？』余曰：『僕就詩論詩，謂其詩可愛，非謂其人可法也。』」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9，頁671。又包世臣《黃徵君傳》：「（仲則）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包世臣：《小倦遊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鈔本），卷9，頁480。

仲則的形象是：

1. 天才
2. 落拓不偶
3. 多情好色
4. 詩似李白
5. 詩多窮愁、幽苦語

可作補充的是，以上形象特點有主有次，1、2、4、5 是主要特點，幾凡論及黃仲則的都會言及；3 則主要是評論詩人性格，或者詩風，然而並沒有分析或考證綺艷詩的本事。應當指出，黃仲則在清代已有「多情好色」的形象。然黃仲則的情事，卻鮮見於諸家記述；清人大多從性情上、詩風上置評，茲引部份評論如下：

「似此星辰非昨夜句，雋語也」（洪亮吉《北江詩話》）<sup>⑧</sup>

「檢點溪山餘笠屐，刪除花月少精神」（洪亮吉〈劉刺史大觀為亡友黃二景仁刊《悔存軒集》八卷，工竣，感賦一首，即東刺史〉）<sup>⑨</sup>

「多情真箇損年少，好色有誰如國風」（袁枚〈哭黃仲則〉）<sup>⑩</sup>

「仲則先生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而詩頗深穩，讀者雖歎賞而不詳其意之所屬，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

（包世臣〈黃徵君傳〉）<sup>⑪</sup>

「耽酒好色」（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sup>⑫</sup>

---

⑧ 洪亮吉：《北江詩話》，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5冊，頁2255。

⑨ 洪亮吉：《卷施閣詩》，同前註，第2冊，頁867-868。

⑩ 袁枚撰，王英志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冊，頁665。

⑪ 包世臣：《小倦遊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9，頁480。

⑫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9，頁671。

「少年名作，雅近謫仙，其善者豪宕感激，韻概俱勝，如憑虛御風，不可捉摸，而頽放淺滑，時亦不免。」（徐世昌《晚晴簃詩匯》）<sup>13</sup>

大致上都以儒家溫柔敦厚標準置論，即使指陳其綺艷之作，如包世臣云「詩顧深穩，讀者雖歎賞而不詳其意之所屬」、徐世昌云「頽放淺滑，時亦不免」，但也沒有以知人論世之方式，舉例探究他的綺艷詩篇。就筆者所知，清代文獻記載〈綺懷〉本事雖然不多，但仍有猜度之人，如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便云：

武進黃仲則〈綺懷〉詩十六首，人多傳為中表之私。但觀詩中如「妙語諧謔擅心靈，不用千呼出畫屏」等語，似非閨秀身分，想不過婢子，略有慧心者。又云「試歌團扇難終曲，但脫青衣便上昇。曾作龍華宮內侍，人間駟僮恐難勝。」則為青衣小婢無疑矣。又「夤緣湯餅筵前見」，若果中表之親，縱已適人亦不必夤緣始得見也。宜黃陳少香先生、曩客毘陵聞彼處士夫言之甚悉，皆指為仲則姑母某姓之婢，似可無疑。總之義山〈錦瑟〉諸說不一，皆可為寄情之什，作香草美人觀可也。<sup>14</sup>

「人多傳為」、「言之甚悉」，又以李商隱〈錦瑟〉類比之，可見〈綺懷〉雖不載於選本，但清人對這一組詩依然興趣甚濃。然而，從上引林昌彝談論時都很審慎掌握分寸，近於考據，又以「香草美人」之說包裝，這相信是受溫柔敦厚詩說影響，實際上並沒有解釋黃氏綺艷詩為何可以聯上「香草美人」傳統；這就表示了論者對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綺艷詩懷有戒心，解釋時與綺艷主題保持距離<sup>15</sup>，而

<sup>13</sup>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98，頁224。

<sup>14</sup>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5，頁344。

<sup>15</sup> 清人談黃仲則〈綺懷〉其實不少，但大都流於印象式批評，再補數則如後：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18：「武進黃仲則〈綺懷〉詩，『玉鉤初放釵初墜，第一銷魂是此聲』，傳神之筆可為綺懷詩絕唱。前明王次回、近代袁香亭喜作香奩詩，皆不能有此神妙。然仲則天生情種，以此促其天年；杜樊川薄倖之名，亦才人之一病也。」同前註，頁478。邱燦堃云：「本朝黃仲則〈綺懷〉、樂蓮裳〈綠春〉諸作，芬芳悱惻，突過古人。若王次回〈袁香亭〉，靡靡之音，非



落入看似理所當然的「香草美人」窠臼。

### 三、黃仲則情史的發掘與解讀

承上所論，黃仲則在清代以窮愁天才著稱，論者基本肯定綺艷詩為其名作，但解讀上卻與綺艷主題保持著警覺與距離。那黃仲則的綺艷情史到底在什麼時候、什麼語境下「被關注」、「被發掘」呢？而且，在解讀策略上，又可以作何種詮釋？本部分要解決的便是這些問題。

民國年間最早指出黃仲則綺艷詩中的本事，是徐珂編的《清稗類鈔》「情感類」所載「黃仲則綺懷詩」：

武進黃仲則主簿景仁集中〈綺懷〉詩十六首，蓋為其意中人而作也。意中所適者，為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故詩句云「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錦江疑在青天上，望斷流頭尺鯉魚。」又云：「忍見青娥絕塞行。」是其證也。其人僅中人姿，故詩中絕不言其美<sup>16</sup>。

後來易宗夔編《新世說》時，在〈惑溺〉裡完整收錄上文<sup>17</sup>。徐珂沒有交代資料來源<sup>18</sup>，估計應為清人之筆記。而該書編於1916年，《新世說》則遲兩年於1918年出版。總之，在民國成立之後、此二書出版之前，〈綺懷〉本事之考察並不流行。但這種情況在二十年代中期卻出現轉變，評論黃仲則其人其詩的文章，多以知人

---

雅奏也。」見邱燦菱《五百石洞天揮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4，頁122。沈濤云：「黃仲則〈綺懷〉云『玉鉤初放釵初墮，第一銷魂是此聲』，何等旖旎。」沈濤：《皕廬詩話》，杜松柏主編：《清詩話訪佚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第3冊，卷上，頁254。

<sup>16</sup>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冊，頁3496。

<sup>17</sup> 易宗夔：《新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8，頁27。

<sup>18</sup> 〈凡例〉云：「本書資料以平時隨筆自行札記之事，分隸各類，或從家藏秘笈搜采而得，故與近今流傳之本微有不同。」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冊，頁10。



論世方式，去考察〈舊感雜詩〉、〈綺懷〉等篇的本事，甚至以這些詩篇去組織詩人的一生，成為這時期黃仲則研究最亮眼的一頁。開此風氣者，卻是新文學中堅郁達夫的一篇小說〈采石磯〉。

郁達夫〈采石磯〉撰於1922年11月20日，1923年發表於《創造季刊》<sup>19</sup>。該小說以黃仲則為主人翁，寫他於朱笥河當幕客時的經歷（1771冬至1773冬）。小說以詩貫串，可以說是一篇詩傳，該篇曾引用的詩，順列如下：

1. 〈感舊〉四首全引
2. 〈感舊雜詩〉四首全引
3. 〈綺懷〉第十五首摘引領聯、第十六首摘引尾聯
4. 〈秋夜〉
5. 〈太白墓〉
6. 〈雜感〉
7. 〈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

當中〈綺懷〉並非作於任朱笥河幕客時，〈秋夜〉寫作年較〈太白墓〉遲約一年。郁達夫小說引用詩歌前，大都有標示出處及卷次，他依據的是《兩當軒全集》，本來就以編年順序分卷，故他不會不知錯雜了其他寫作時期的詩<sup>20</sup>。有趣的是，小說唯一沒有標示卷次的，正就是〈綺懷〉和〈秋夜〉，前者見《全集》卷十一，後者則載於卷六，郁達夫刻意漏去出處，隱藏了編次之不合邏輯，同時暴露了他以意逆志地運用合適詩篇，進行文學創作，以自圓其所要書寫之黃仲則形象。郁達夫此篇乃「夫子自道」，向來認同者眾，論者大抵留意到小說裡黃仲則落落寡合、多愁善感的性情，及懷才不遇的苦悶<sup>21</sup>。本文無意重複既有論說，筆者

<sup>19</sup> 郁達夫：〈采石磯〉，載《創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頁51-68。

<sup>20</sup> 郁達夫後來在金民天《黃仲則詩詞》的〈關於黃仲則〉一文，明白提到他少年時曾買過由黃仲則孫媳吳氏重刊的《兩當軒全集》，後來失去，而於1921-1922年間在安慶教書時又買了一套，並從頭至尾細讀一遍。1922年正是這篇小說撰成的一年。見金民天：《黃仲則詩詞》（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第2版），頁3、8。

<sup>21</sup> 黃蓀樹、章谷等人編的《黃仲則研究資料》就載了郭沫若、唐弢和盛仰紅的文章，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例子。黃蓀樹、陳弼、章谷編：《黃仲則研究資料》，頁260-267。

關注的，卻是他對黃仲則愛情故事之書寫。小說第二節的二千八百多字裡，密集引用〈感舊〉四首、〈感舊雜詩〉四首，兩首〈綺懷〉的摘句，及〈秋夜〉，是全篇小說用詩用得最密集的部份<sup>22</sup>。他為黃仲則書寫了「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那時候：年方十六的伶俐少女對仲則青眼有加，二人墮入愛河，卻因仲則過年回常州而分開。後來仲則再到宜興，觸發舊情，於是寫了〈感舊四首〉。三年後，仲則在揚州城隍會，偶遇一貌似他舊戀人的少婦，然她已嫁作商人婦，於是仲則又寫了〈感舊雜詩〉四首。這就是郁達夫為黃仲則重新設計的少年情事。郁達夫沒有交代少女的背景、身分和外貌，無視了清代以來的既有版本，而將焦點放在女子的青眼、二人話別之情景，和仲則事後的追懷上，以抒情之筆替代本事考據。他筆下的黃仲則，相當敏感，送別時涕淚縱橫，與少女哭作一團；舊地重遊又感舊作詩；甚至在別的地方，疑心所見之商人婦是否就是舊戀人，已足以讓他觸發舊情。

郁達夫的精構，更在將抒情向度由少年情事過渡到身世之感。他寫黃仲則追懷舊事，寫下〈感舊四首〉，然後是：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般，轟轟烈烈，剛在發育，當時新中了秀才，眼前尚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裡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裡，月光裡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箇冷瘧，覺得毛細管，都竦豎起來了。

「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sup>23</sup>

<sup>22</sup> 小說共六個部份，〈太白墓〉在第四部份，〈雜感〉和〈筇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在第六部份。

<sup>23</sup> 郁達夫：〈采石磯〉，《創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頁50。

明明在追懷舊情，通過今昔對比，自然地轉移到身世之感。為什麼可以有這種過渡？那是因為郁達夫將黃仲則情之所起，定在少女的慧眼識英雄。郁氏細心留意到〈感舊雜詩〉中「獨將青眼到書生」、「非關識別為憐才」等句，精煉地將這段情事濃縮成「青眼有加，無疾而終」的愛情悲劇，而小說寫黃仲則當時的處境，也是得到朱笥河的器重，但沒有實績，及為同儕所妒。故此，黃仲則的苦悶，同是來自「青眼有加」，但此次雖未「無疾而終」，卻已無法樂觀。然後黃仲則鬱結在窮愁中，無法排遣，於是吟出〈綺懷〉幾句詩來<sup>24</sup>。所吟雖只斷句，並沒有寫成完整的詩篇<sup>25</sup>，而詩的多義性也可產生不同的解讀。但清代以來，〈綺懷〉已穩定指向綺艷情事，郁達夫用之於小說，竟然沒有用於情事，這難道不是別有用心麼？更有趣的是，郁達夫繼續寫黃仲則身世之感，又虛構了「偽儒戴震」來訪朱笥河，激發了仲則的憤世嫉俗。該部分最後，竟又寫宿醉後的詩人，「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寫了本應在一年後才面世的〈秋夜〉作結。郁達夫以情事作該部分之起始和終結，把身世之感夾雜其中，情緒上彼此相混，也就將這段情事的意義提高了、複雜化了，使之構成黃仲則詩人性格的重要成分，當讀者認同黃仲則是「窮愁詩人」時，可以忽略愛情悲劇的影響嗎？

郁達夫〈采石磯〉對黃仲則的設定，大約三年後得到章衣萍以學術研究的姿態回應。1925年，章衣萍在《學林雜誌》分上下篇發表民國年間第一部黃仲則評傳，五年後，又由上海北新書局整合兩篇獨立成書出版。郁達夫〈關於黃仲則〉一文提到他看到的評傳就是指章氏這部書。他這部評傳上篇介紹黃仲則的生平，下篇評論其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運用材料除了詩外，亦包括詞，及全集所載的七則詩評，在這層面裡，章氏是全面評價黃仲則其人、其詩、其詞、其詩論的第一人。但這部評傳的其書寫焦點，及書寫方式卻更顯價值。

書寫焦點方面，章氏評傳上篇寫黃仲則之生平，描寫其為「窮愁天才」。整個上篇的論述、判斷及引用材料，都和清人或《清史稿》之論相近。唯一突出的是他特別論述了黃仲則的情史，文中云：

<sup>24</sup> 「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同前註。

<sup>25</sup> 「但是他的心想，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同前註。

我們都知道仲則十九歲的時候便結婚了，但在兩當軒集中都有許多纏綿悱惻的情詩情詞。我們總疑心孤傲多情的仲則一定有許多的艷史。<sup>26</sup>

評論詩人生平，「艷史」從來不重要，甚至要爲之諱。《清史稿》、《清史列傳》、武進縣志裡的黃仲則傳，都沒有提及仲則這方面事跡。即使友好如洪亮吉，算是最親近、最清楚黃仲則其人其事，撰寫《行狀》時也沒有提及其愛情，只在最後寫了「娶於趙氏，生一子二女」而已<sup>27</sup>。史傳書寫和文學品味存有差異，在價值判斷上，前者比較恪守儒家事功的一套，後者則可包容更多面向。所以，「艷史」在黃仲則的史傳書寫裡從來缺席，亦從來沒有爭議。而在文學評論範疇，雖然毀譽不一，但至少是可以爭論的議題。郁達夫寫〈采石磯〉，是小說，他不必顧慮史傳書寫的限制，可以在情史上作更大的發揮。如此，情史在黃仲則整個生命裡可以意義非凡。章衣萍爲黃仲則撰評傳，「評」的是黃仲則的作品，以「傳」黃仲則其人。他選擇將「艷史」寫進評傳，正好回應了史傳書寫的傳統，而文學便成了這種回應的最有力依據。他這種寫法是否得力於郁達夫的文學創作？筆者掌握文獻材料不足，未敢斷然下判斷。但觀察評傳對黃仲則「艷史」的書寫，卻與郁達夫的小說有太多肖似。章氏的話不多，唯一的判斷是：

但是仲則的戀愛似乎沒有成功，那個女子後來終於嫁了旁人了。<sup>28</sup>

其他部份就簡單地指出仲則與情人的相聚與分別。章氏與郁達夫的判斷有相似處，但章氏於這部份卻刻意迴避黃仲則的詩歌，全部以詞作證據。當然，這些詞作較詩歌所寫的，更旖旎艷麗，引用詞作也可兼及黃仲則此體的特色及成就。但〈感舊〉、〈綺懷〉等艷情詩意指情事，一向是常識，郁達夫的小說又已完整引用和

<sup>26</sup>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上篇），《學林雜誌》卷1第12期（1925年），頁6。

<sup>27</sup> 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黃景仁撰，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606。

<sup>28</sup>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上篇），《學林雜誌》卷1第12期（1925年），頁7。

發揮，章衣萍的刻意迴避反而顯得有些突兀了，特別他的判斷和郁達夫那麼相似！所以，章氏於評傳下篇評論黃仲則的詩歌成就時，首緣「抒情詩」，抒情範圍卻只有悲哀情史和生之苦痛（窮愁），後者僅引用及評論了〈都門秋思〉四首。前者卻佔著絕大的篇幅，引用的，正是〈舊感雜詩〉四首、〈感舊〉四首、〈綺懷〉十六選七首，這個組合正正是郁達夫小說引錄的「加長版」（〈綺懷〉引錄七首，郁達夫小說僅引兩首中的兩聯），而評論卻是簡直是翻版，引〈舊感雜詩〉四首後云：

抒情詩做得好的應該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仲則這幾首詩自然是詠他的戀人，一段悲哀的情史！我們要懂得他的悲哀情史，應該再比較起來讀下面幾首詩：<sup>29</sup>

接著引〈感舊〉四首，後云：

有人說上面的詩是詠仲則在宜興沈里讀書時的故事。我們可以想見仲則與一個「羅敷未嫁身」的少女，相戀相愛的纏綿情形。「感舊」是別後重來的悲哀回憶！但是那個少女後來竟嫁給旁人了，我們讀「舊感雜詩」可以看出。可憐我們的薄命詩人的一生情史！<sup>30</sup>

「有人說」就是郁達夫。評傳除了換成論述性的文字外，判斷實在沒有不同。章氏更將此延伸到〈綺懷〉的解讀：

這幾首抒情詩真是又宛轉，又細膩，又悱切動人！我們且不管「綺懷」中所戀是什麼女子，當然又是「感舊」裡的舊相思，（也許不是！）但就詩論詩，這幾首詩中竟不少千古不滅的名句！記得胡適之先生說過：「抒情

<sup>29</sup>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下篇），《學林雜誌》卷2第2期（1925年）頁3-4。

<sup>30</sup> 同前註，頁4。

詩最易流入輕薄。抒情詩而帶著幾分悲哀之品格，便提高了。」仲則的情詩之所以能這樣動人，就因為他的情史受過悲哀的洗禮！<sup>31</sup>

郁達夫以〈綺懷〉完成由情事到身世之悲的過渡，肯定了情事的意義。章氏對〈綺懷〉的解讀，卻一如傳統，僅指情事，只是價值上肯定讚揚，有別於清人之排拒而已。不過，章氏書寫黃仲則的情史，還是有他的突破意義的。首先，他以之作爲「傳」黃仲則的重要部份，承認這類文學作品，有助形塑一個較接近真實的黃仲則形象。其次，他繼承了前人的評論和文學資源（清人評論和郁達夫的小說），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劃定了愛情詩的範圍，〈感舊〉、〈舊感雜詩〉和〈綺懷〉成爲日後黃仲則研究的重要文本，這不能不說是章氏評傳的影響，此點後文再述。再者，更重要的是，他將〈綺懷〉等作的價值提高到文學理論的層次。評傳在引用〈綺懷〉後，緊接一段「詩人之詩」和袁枚「性靈說」的評述，他說：

我們讀過上面所引的幾首詩的人，當感覺仲則的詩，純粹是「詩人之詩」（Poets' Poem）。什麼是「詩人之詩」呢？詩人之詩就之（是）發之於性靈，不落古人詩體之窠臼，不強為修飾，不用空虛之理以炫人，換一句話說，就是能獨往獨來，自造一種境界。<sup>32</sup>

然後指清代最有價值的詩論就是袁枚的「性靈說」，並謂黃仲則是當中健將。將黃仲則劃爲性靈派，或可爭議。但上引章氏所言關於「性靈」的幾個「不」，沿自清代萬應馨<sup>33</sup>，基本上可總結爲推許張揚個性的詩，而黃仲則將綺艷情事入詩，

<sup>31</sup> 同前註，頁 5-6。

<sup>32</sup> 同前註，頁 6。

<sup>33</sup> 萬應馨是黃仲則的朋友，他曾言：「仲則天才，軼群絕倫，意氣恆不可一世，獨論詩則與余合。余嘗謂今之爲詩者，濟之以考據之學，艷之以藻繪之華，才人學人之詩，屈指難悉，而詩人之詩，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則深韙余言，亦知余此論蓋爲仲則、數峯發也。」萬應馨：〈序黃仲則詩〉，《味餘樓臆稿》，轉引自黃蓀樹、陳弼、章谷編：《黃仲則研究資料》，頁 162。章氏評傳也有原整引用這段文字。



正合章氏論述。所以，凡是有關情事的作品，無論是詩是詞，章氏也一律予以肯定。他說黃仲則的詩不如他的詞，而「仲則的情詞，幾乎沒有一首不好的」<sup>34</sup>，章氏對詞有偏好，認為其形式限制較詩為少，可以更有利抒情寫意。章氏評傳下篇引黃仲則詞八首，泰半是愛情之作，加上上文對仲則情事之運用，可見章氏所云之「抒情」，很大部分是指愛情，而這又是仲則之「性靈」所在。如是，章氏有以下兩個論斷：

從中國文學史上看來，南方是「兒女文學」的老家，北方是「英雄文學」的老家。我們詩人黃仲則，便是「兒女文學」的聖手！<sup>35</sup>

及

我們評論黃仲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可以大膽地說：仲則的詩，以情感纏綿勝。清代詩人，天才奔放如仲則者，清末僅有一個金和。但是仲則的詞，自宋以後，仲則可稱獨霸——納蘭性德號稱清朝一代詞宗，以我看來，造句之精巧，立意之幽遠，寄託之高深，納蘭性德不及黃仲則多多了！<sup>36</sup>

章氏這兩個論斷，都基於對黃仲則情事的發揮，這就是章氏評傳的第三個突破意義<sup>37</sup>。這三種意義，使整部評傳流露著強烈的抒情色彩，可以說是一種抒情之筆。

章衣萍以抒情之筆撰《黃仲則評傳》，自與其個人偏好有關。他和胡適、魯迅關係頗密切，在〈黃仲則評傳〉上下篇發表同年（1925年），他的代表作《桃

<sup>34</sup> 同註28，頁11。

<sup>35</sup> 同前註，頁12。

<sup>36</sup> 同前註，頁14。

<sup>37</sup> 章氏評傳的另一特色是大量運用西方人言說來與黃仲則對比，這種傾向亦來自郁達夫。郁之〈采石磯〉開首引用歌德《浮士德·獻詞》的一段德文原文。章氏評傳亦有引歌德《浮士德》，此外亦提及盧梭、尼采、易卜生、托爾斯泰、弗羅特、拜倫、愛狄生等。這當關涉上世紀初的翻譯及現代主義傳入等問題，本文限於篇幅，暫且不表。



色的衣裳》出版（後來再版改名為《情書一束》），此書以他自己和才女吳曙天，及畫家葉天底的三角故事為題材，以九個短篇組合成書。由於宣傳得力，話題敏感，寫法大膽，此書五年間再版十次，非常暢銷，章氏自己亦得以躋身《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家之列。愛情就是他賴以成名的資本，他亦以才子自居。所以，他之欣賞、書寫黃仲則，個人色彩很濃厚，也許，可以算是一種自我宣傳手段。然而，無論《黃仲則評傳》的撰寫動機是什麼，它對後來的黃仲則研究起了頗大影響。如果我們把二、三十年代的黃仲則研究瀏覽一遍，就會發覺論調及文獻運用上的肖似，這肯定不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可以解釋的。

例如黃侃的弟子武西山，1926年就發表過一篇〈薄命詩人黃仲則〉，用力寫黃仲則的天才、抱負及詩的真情實感。雖然如此，但文中卻特別提到仲則風流和兒女情長的一面，所引的是〈綺懷〉；他亦評論了仲則的詞作，指其「新警」、「纖麗」，亦引用了〈步蟾宮〉、〈酷相思·春暮〉，這幾篇詩詞都在章氏評傳引用過的。1927年，淦克超〈黃仲則的詩〉中連用〈感舊雜詩〉、〈感舊〉、〈綺懷〉來述黃之愛情，猜測仲則少年時「留下不少傷心的戀愛故事」，肯定了愛情對仲則的影響。1932年，陶愚川〈論詩人黃仲則〉引〈綺懷〉、〈別意〉、〈風流子·江上遇舊〉、〈感舊雜詩〉、〈最高樓〉等篇寫其戀愛與失戀，以〈憶內〉寫夫婦閨房之樂。論抒情詩時首緣〈感舊〉，將「愛之苦痛」與「生之不安」並列<sup>38</sup>。除了所引作品與章氏評傳相近外，「愛之苦痛」和「生之不安」，其實從章氏評傳內「情史受過悲哀的洗禮」和「生之苦痛」而來<sup>39</sup>。1934年，黃逸之撰《黃仲則年譜》，也將仲則之「早歲之旖旎風趣」寫進譜裡，所舉正是〈感舊〉四首

<sup>38</sup> 陶愚川：〈論詩人黃仲則〉，《大夏期刊》1932年第3期，頁8-19。陶愚川撰此文時就讀於大夏大學教育系，其時頗活躍於投稿，其文見於《大夏期刊》與《認識》等刊物。1930年，陶曾於《認識》刊登一篇短篇小說，題為〈一個涼風沉醉的深夜〉，頗有和應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之意。其篇末有附記云「現代青年所感覺到的最大的煩悶：就是『生之不安』和『愛之苦痛』；因為國家政局之時常變更，所以就覺著生之不安，因為舊禮教的桎梏未除，所以就嘗受到愛之苦痛，這篇東西裡的主人翁『我』，就是感覺到這種煩悶的青年。」陶愚川：〈一個涼風沉醉的深夜〉，《認識》1930年第3期，頁53。

<sup>39</sup>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下篇），《學林雜誌》卷2第2期（1925年）頁5、7。

④〇。1935年，陸樹柵〈哀愁詩人黃仲則（1749-1983）〉介紹黃仲則的生平、性格及詩歌，文章最後一部份就闡述了仲則的戀愛史，指其抒情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④一，然後連引〈舊感雜詩〉、〈感舊〉，〈綺懷〉，並說明詩中的本事是指宜興讀書時相戀的少女，後來嫁了別人，最後結論是「他在少年時，處境既然不很好，又遭受變愛的刺激，一生貧病的種因，也許和這事很有關係的」④二。陸氏的書寫明顯融合了郁達夫和章衣萍二文的觀點。以上所舉，僅為部份，但已足以證明章氏評傳的影響，而黃仲則的情史及綺艷詩，便在這短短十年左右完成經典化，成為代表黃仲則其人其詩的重要部分。

除了以上總論黃仲則的文章外，更有專以「戀愛史」或「戀愛詩」為題的文章。筆者所見，已有邱竹師〈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1929）④三、謝憫生〈詩人黃仲則的戀愛〉（1935）④四及譚正璧〈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跡考〉（1945）④五等篇。邱竹師該文發表在《新月》，該雜誌由徐志摩、胡適等人創辦，是二十年代末重要的文學發表平台④六，參與編輯和撰文的有梁啟超、林徽音、梁實秋、儲安平、羅隆基、邵洵美、聞一多、沈從文等人。《新月》上刊載絕大多數是現代文學，也有翻譯及出版消息，甚至政論。但差不多每一期（該雜誌為月刊）刊登最少一篇以古典文學為題的文章。這些文章極少數是嚴謹的學術論文，如胡適〈考

④〇 黃逸之：〈黃仲則年譜〉，黃葆樹、陳弼、章谷編：《黃仲則研究資料》，頁27。原書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34年出版。

④一 陸樹柵：〈哀愁詩人黃仲則（1749-1983）〉，《江蘇研究》第1卷第6期（1935年），頁6。「1983」應為「1783」之誤。

④二 同前註，頁8。

④三 邱竹師：〈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頁46-74。

④四 謝憫生〈詩人黃仲則的戀愛〉，《人間世》1935年第42期，頁22-23。

④五 譚正璧〈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跡考〉，《大眾》1945年第31期，頁90-94。

④六 《新月》並不是「新月社」專用的文學平台，該刊創刊號的宣言〈新月的態度〉明言：「我們這月刊題名新月，不是因為曾經有過什麼『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為有『新月書店』，那是單獨一種營業，它和本刊的關係只是担任印刷與發行。新月月刊是獨立的。」，載《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頁3。

證紅樓夢的新材料》<sup>47</sup>、徐景賢〈徐光啓著述考略〉<sup>48</sup>等，其他都是頭巾氣不重、筆調較輕鬆、富有抒情味道的文章，如聞一多的〈杜甫〉<sup>49</sup>、蘇雪林〈愛國尚武的詩人陸放翁〉<sup>50</sup>，也有不少是以古典文學為題的故事新編，例如饒孟侃〈梧桐雨——元曲本事〉<sup>51</sup>、歐陽予倩〈潘金蓮〉<sup>52</sup>等。這些文章刊登在一部以現代文藝為主題的刊物，其意義可作深入探討，惟非本文任務，故暫不表。回頭看邱竹師〈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該文介紹了黃仲則的詩風及生平，然後用超過一半的篇幅，整理黃仲則的戀愛史，將之分為兩個時期（戀期、失戀期）、四個階段（初戀期、熱戀期、追憶期、證情期）。他運用黃仲則的詩詞<sup>53</sup>，構組了整個完整的愛情悲劇；他承繼了郁達夫、章衣萍的書寫，即仲則宜興讀書時結識少女，墮入愛河，但少女後來改嫁別人。但邱氏該文的描寫遠較郁、章二人細緻精微，什麼場合碰面，說了什麼話，情緒如何，連二人何時目成（即性行為）、有什麼反應，也一一具體指陳。邱氏的書寫下，黃仲則與意中人雖然不能成眷屬，但彼此情感卻矢志不移，那些悱惻動人的詩詞，全都深致低迴地抒唱了詩人的幽怨心曲。如上所言，這是「頭巾氣不重、筆調較輕鬆、富有抒情味道的文章」，文字富有情感色彩，引文的處理更是精彩，請看一部分為例：

<sup>47</sup> 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載《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頁114-144。

<sup>48</sup> 徐景賢〈徐光啓著述考略〉，載《新月》第1卷第8期（1928年），頁56-69。

<sup>49</sup> 聞一多：〈杜甫（未完）〉，載《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頁7-22。

<sup>50</sup> 蘇雪林：〈愛國尚武的詩人陸放翁〉，兩篇載於《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頁40-66。及《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頁63-78。

<sup>51</sup> 饒孟侃〈梧桐雨——元曲本事〉，簡本先載《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頁20-32。後來擴充成兩篇載於《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頁59-74，及《新月》第1卷第7期（1928年），頁77-86，唯沒有寫完。後來其中一部份又載《時事月報》第16卷第1期（1937年），頁1-14，但也是沒有完篇。

<sup>52</sup> 歐陽予倩〈潘金蓮〉，載《新月》第1卷第4期（1928年），頁53-90。

<sup>53</sup> 包括〈綺懷〉、〈醉春風·幽約〉、〈浪淘沙·幽會〉、〈如夢令·曉遇〉、〈別意〉、〈步蟾宮〉、〈風馬兒·幽憶〉、〈大有·秋夜有懷〉、〈醜奴兒慢·春日〉、〈秋夕〉、〈感舊〉、〈中秋夜感舊〉、〈減字木蘭花〉、〈花前曲〉、〈一叢花·懷寧道中〉等篇。

啣！春光漏了，不知道此時這位詩人的心情怎樣？又如：

「顫提裙衩步蒼苔；首驚回；『甚時來？昨宵風露為誰捱？』念我一番寒澈骨，分半角錦衾，偎。」

「端相一霎太津津；乍微嗔，卻回身；人間天上，此景最消魂；『我戀卿卿，卿自會；卿戀我，是何因？』」〈江神子〉

他倆自這番以後，便噓寒問暖，朝夕殷勤。如〈曉遇〉云：

「細雪乍晴時候，細水曲池冰皺。忽地笑相逢，折得梅花盈手；『肯否？肯否？贈我一枝消酒？』」

「『聞說玉郎消瘦，底事清晨獨走？』報道：『未曾眠，獨立閒階等久。』

『寒否？寒否？剛是昨宵三九。』」

「一陣雀聲噪過，滿院沈沈人臥。『此去是書齋，只在春波樓左；且坐，且坐，我共卿卿兩個。』」

「一抹蓬鬆香鬢，繡帶綰春深淺，忽地轉星眸；『因甚紅潮暈臉？』『不見？不見？日上珠簾一線？』」〈如夢令〉<sup>54</sup>

他靈巧地運用標點符號（特別是問號），又將部分詞句詮釋為對話，大大加強了詞的抒情效果。再者，他這個部分的小標題是「黃景仁的戀愛詩歌」，但當中卻大量引用詞作，可見他是以「泛詩歌」或者「抒情詩」（lyric）的概念來處理詩詞，亦即以抒情作為兩種文體的共通領域，邱氏以此達到的「結論」是：

對於他的文藝，也祇是局部的介紹。但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熱情的人。

至於他的藝術手腕，可以說是：「寓感情於白描，寄心臆乎毫末，清麗而纖穠，哀怨而不衰颯」矣。<sup>55</sup>

這一種「局部」選擇及抒情之筆，我們與其說他要「論證」、「考索」黃仲則的

<sup>54</sup> 同註 42，頁 11-12。

<sup>55</sup> 同前註，頁 20。

戀愛詩歌本事，倒不如說他要「文學地」書寫一個「熱情」的黃仲則。所以，邱氏該文後還附了自己編的〈黃景仁年譜〉，將這段他精心構築的愛情悲劇寫進譜裡去，成為詩人十四至十七歲（初戀、熱戀），及二十七歲時（重遇）的重要經歷。邱竹師這篇文章，配上這個年譜，以文學方法進行人物歷史的考索，不就可以說是「以詩證史」麼？後來謝憫生、譚正璧等人的專論文章，有詳有略，但所論述的都沒有超過邱竹師該文的範疇，都同樣「考索」黃仲則的戀愛史、同樣肯定戀愛悲劇對黃仲則個人詩風的影響。可以說，他們的書寫靈感來自郁達夫和章衣萍，但書寫方式和判斷卻深受邱竹師的影響。

#### 四、金民天《黃仲則詩詞》的定格作用

除了單篇文章外，三十年代一部專屬選本，可以進一步觀察到黃仲則研究的定見與論述意義。1932年，金民天編了《黃仲則詩詞》（以下簡稱金選），是民國年間最早出版的黃仲則專屬選本。書前載有郁達夫的〈關於黃仲則〉，及金民天的〈黃仲則生平及其作品〉。這裡可從選詩方式探尋其動機和意義。

金選共選黃仲則詩 215 首，其中七律最多，有 80 首，其次是七絕 41 首、五律 35 首、七古 31 首、五古 16 首、五絕 12 首。專屬選本和斷代選本不同，前者有更大的空間去表述詩人的詩歌特徵，及其性情才情。當然，編選者的眼光能掌握這種空間，去塑造他所想的詩人形象。例如翁方綱編《悔存詩鈔》便將「放浪酣嬉」之篇一律排拒，以塑造黃仲則天才高絕，「讀書心眼，穿穴古人」，詩風「沉鬱清壯」的形象。據筆者統計，金民天選入的詩，有四成左右不收於翁方綱的《悔存詩鈔》<sup>55</sup>。較之翁選，就題材而言，主要補入了綺艷之篇，如名作〈感舊〉、〈舊感雜詩〉、〈綺懷〉十六首等全部入選；及大量遊歷詩，如〈出都過蘆溝橋〉、〈曉發芥泉驛〉、〈渡運河〉、〈安肅道中〉、〈荊軻故里〉、〈至新安雜感〉、〈登千佛閣〉等篇，這些詩作都不見於翁氏選本。這兩類題材的選

<sup>55</sup> 金民天選本共收黃仲則詩 215 首。其不見於翁方綱《悔存詩鈔》者，五絕 6 首，七絕 15 首，五律 14 首，七律 30 首，五古 9 首，七古 17 首。總共為 91 首。

入，金民天在該書目錄前〈黃仲則生平及其作品〉一文曾作出交代：

第二年邵師（指邵齊燾）就脫離了人間，在青年詩人心中，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自傷他的孤零，寥落不堪，乃作四處的浪遊，由武林而四明觀海。溯錢塘、登黃山。復經豫章，汎湘水，登衡岳觀日出。浮洞庭，由大江而歸。在這流浪的三年中，得到了許多的詩。我們很能夠曉得有許多的好詩，都是從他漫遊中得來。

此選本重視詩人的遊歷，故所錄甚多。至於綺艷之篇，金民天這選本是民國年間，第一部錄入〈感舊〉、〈綺懷〉這些綺艷詩作的選本。金民天在上引一文裡，反復提到黃仲則的戀愛情事與抒情詩，並直接引用這些詩篇來論證：

至於他的抒情詩，更是能夠旖旎悱惻，體貼入微。<sup>57</sup>

又：

在這切貼，婉轉，細膩，悱惻的〈綺懷〉詩中，我們不能不佩服他「艷而不淫」的詩格來。黃仲則的詩完全是他整個靈感的流露，並不是假意的做作。<sup>58</sup>

他試圖透過這些選詩，和〈醜奴兒·春夜〉、〈步蟾宮〉等詞作來證實其推斷：

我們可以推想得一個天才詩人的黃仲則是體貼入微的，一些不像野男子那般的粗魯。<sup>59</sup>

---

<sup>57</sup> 金民天：〈黃仲則生平及其作品〉，《黃仲則詩詞》（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第2版），頁10。

<sup>58</sup> 同前註，頁13-14。

<sup>59</sup> 同前註，頁15。



並以此指出黃仲則有「兒女文學的神技」，可以代表以兒女文學擅名的南方。金民天這方面的論述富有時代意義。上文已曾指出，自郁達夫發表〈采石磯〉小說後，章衣萍、邱竹師等人相繼和應，黃仲則的〈感舊〉、〈綺懷〉等綺艷詩流行一時，成為黃仲則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金民天該文除了題材外，還具體地從寫作方法上評論黃仲則的「真率自然」。金民天指也在黃氏寫詞喜用白描，其平仄音律，又突破格律所限，構成「自然的詞調」。這樣，不正好和黃仲則之「多情才子」形象若合符節麼？這種形象，不也正好支援了當時抒情高於格律、「自然音節」的討論麼？二十年代，作家對新詩進行多向度的探索，其中一方面就是音節。當時流行的說法有胡適的「自然音節」、郭沫若的「情緒節奏」，及徐志摩、聞一多等提倡的「格律音節調和」等。<sup>60</sup>金民天的看法，似在回應這些論述；亦因為「音節論」屬於熱門話題，所以他介紹時才會預期讀者有疑問：「因為怕讀者發生疑問，不得不在此先說一聲」，而後借題發揮地表達詞人天性高於詞律的觀點：

本來詞是情感流露的產物，情感所至，則詞句所至，如果緊緊乎以律式來限制，那情感也有可憐了，再律這件東西，也不是古人多事故意造出來限制情感的，也為詞可合譜，易於節拍，可以譜入工尺上去歌唱的一種原因。好在，我們是在談他的詞，不是在講究他的律。就像宋蘇東坡，清龔定庵等，也常常自動變更律式，這都是豪情詩人自賦的天性，我們正可不必深論。<sup>61</sup>

「豪情詩人自賦的天性」云云，金民天已經不止談論詞了，而是從文學家的角度討論才性與格律的關係；由是，黃仲則的綺艷詩是金民天這種討論的切入點。那麼，綺艷詩的「正名」或「經典化」，在當時不僅是一個解讀特定詩人的問題，

---

<sup>60</sup> 有關這音節的討論，可參王澤龍：〈20年代中國現代詩歌音節詩學初探〉，《學習與探索》2004年第4期，頁97-102。

<sup>61</sup> 同註57，頁18。



更是對「什麼是文學」、「抒情有什麼意義」等理論的哲思。關於這種文學、抒情與敘事的論述，本文最後一節會再探討。

金選的意義並不止於綺艷詩的選擇，和文學理論思考的引入，還在其開首時錄入郁達夫〈關於黃仲則〉一文<sup>62</sup>。與金氏文章不同，郁達夫該文並沒有就綺艷詩大加發揮。他用抒情性濃重的筆調，書寫自己跟黃仲則「結緣」的經過，和黃仲則的一生及作品，試摘其中片段一二：

在這短短的三十四年中間，他走盡了幾萬里路——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做了二千多首詩，二百多首詞，無數的駢文散文。又生了一子二女，負了一身債，大約總流還了許多眼淚和結交了許多朋友。<sup>63</sup>  
把那全集細讀了兩遍之後，覺得感動得我最深的，於許多啼飢號寒的詩句之外，還是他的那種落落寡合的態度，和他那一生潦倒的短命的死。<sup>64</sup>  
黃仲則的詩詞的風行，原是應該的，因為他實在是像唐朝李長吉一樣一位人物，生下來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詩人。他自己原是肺病患者，猜想起來，他的父親，他的兒子，大約總都是帶有結核菌在體內，形狀總都是長身玉立的，因為在他上下兩代，享年也各和他一樣，正當壯歲而夭折了。<sup>65</sup>

這等抒情性的書寫，足見郁達夫對黃仲則的同情。抒情文字夾雜在客觀敘說中，顯得特別亮眼。而郁達夫所欣賞的黃仲則，正是那個跟乾隆一代詩人歌功頌德格格不入，是寫出「語語沈痛，字字辛酸」的詩篇，「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人物。但什麼是「詩人氣質」？郁達夫沒有進一步談，但肯定跟不與俗同流、抒一己之情等元素相關。在郁達夫這種經營下，不必強調綺艷之作，也可概括出黃仲則多愁善感、抒情為尚的詩人形象。

<sup>62</sup> 該文撰於1932年6月。

<sup>63</sup> 郁達夫：〈關於黃仲則〉，金民天：《黃仲則詩詞》（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第2版），頁1-2。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

<sup>64</sup> 同前註，頁3-4。

<sup>65</sup> 同前註，頁7。

所以，郁達夫和金民天兩篇文章，引導讀者循抒情角度欣賞黃仲則的詩詞，及從中思考「詩人的氣質」和「文學的本質」。所以，金選雖然在文獻編輯上水平一般<sup>66</sup>，但卻是民國時期極富特色、亦具有理論色彩的一個選本。

再者，討論至此，本文可以判斷，金民天〈黃仲則生平及其作品〉一文統合了郁達夫、章衣萍、邱竹師三人之書寫，成為集大成而行文簡潔的一篇文章。他所敘說的戀愛故事，原型來自郁達夫的小說；評黃仲則詩詞為「兒女文學的神技」<sup>67</sup>、〈綺懷〉詩「艷而不淫」<sup>68</sup>，則來自章衣萍的評傳；至於稱仲則詞「有自然白描，旖旎風光的象徵」<sup>69</sup>，卻是來自邱竹師。金氏本人的發揮，僅在文末發現仲則寫詞不受詞律所制，發表了天才超越律式的見解，該段文字上文已引用過，此處不贅。正是因為金民天吸收了郁達夫等人的觀點，他的詩詞選自然廣納這些綺艷作品；作為民國年間第一部黃仲則專屬選本，可以發現它和當時黃仲則研究的新方向息息相關。雖然金氏的論述創獲不多，但黃仲則的情史和綺艷詩的化為常識，不能忽視專屬選本的貢獻。尤其五年後朱建新編《黃仲則詩》，屬於中學生普及讀物，同樣選入了這些已成「經典」的綺艷詩，並在凡例說明仲則詩分四期時，將這些綺艷詩引錄，作為不同時期普遍體現「悽愴之音」的依據<sup>70</sup>。朱選中，歌頌升平、遊覽懷古、酬韻、雜題等主題的詩可以不錄，但綺艷之篇卻不可不收，理由是它們關乎仲則「行誼情緒」。「行誼情緒」不就是郁達夫等人書寫出來的愛情故事嗎？如果沒有二十年代的黃仲則熱，那朱選還會作同樣的去取嗎？

## 五、從抒情與敘事中省察

從上文可見，詩人形象在研究重心的改變下得到了調整。雖然，清代和民國

<sup>66</sup> 該選本文獻編輯較粗疏，篇名錯誤者比比皆是。如將〈輓毛明經佩芳〉誤寫成〈輓方毛經佩芳〉。雖大致按寫作年編次，但前後顛倒錯雜者頗多。

<sup>67</sup> 同註 57，頁 15。

<sup>68</sup> 同前註，頁 14。

<sup>69</sup> 同前註。

<sup>70</sup> 朱建新：〈凡例〉，《黃仲則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4-10。

都以「窮愁詩人」作為黃仲則詩人的主要形象，但清代集中突出仲則的多蹇命運、孤傲性情，和天縱之才，弱化甚至無視風流旖旎對仲則形象的影響。而民國則一方面繼承清人，另一方面卻著力表現愛情對仲則之深遠影響，但戀愛對象僅限一人（宜興初戀之少女），雖各有婚約而情深不變，故「風流旖旎」說不上，「情深旖旎」則更準確。在他們的書寫裡，愛情經歷為黃仲則性格發展和詩風形成注入了重要的悲哀元素，是使他成為「窮愁詩人」重要助力。這一種變化，並不反映著詩歌審美標準高低的變化，而是昭示了審美活動由政治脫離，轉向個人情緒。事實上，即使清人不願給予黃仲則〈綺懷〉等作以正面肯定的評價，但也沒有從藝術層面上否定，上一部分引錄洪亮吉、包世臣等人「雋語也」、「詩顧深穩」等評語已見一斑，否定者只是從政治（或倫理）角度去否定或者迴避這類作品的價值。當文學經歷現代主義、文學革命的洗禮後，脫去政治宣傳的外衣，自然會引向文學或者作家本身的探索。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第一便云「言之有物」，具體便是有「情感」有「思想」，他說：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已。<sup>71</sup>

以「情感」、「思想」為前鋒，引出文學形式改革之必要，故後提到的「不摹倣古人」、「須講求文法」、「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皆與文學形式有關。兩年後，胡適〈談新詩〉就更明確指出，文學改革必須解放文學形式：

我常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

<sup>71</sup>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頁1-2。

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sup>72</sup>

以此觀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黃仲則研究，本文認為，循「文體」角度可以發現一些意義。首先，以抒情打破文體的既有規範，是此前古代文學研究極罕見的現象。上一節分析黃仲則戀愛故事的書寫時，曾指出郁達夫的影響。郁達夫〈采石磯〉是文學創作，本不必太過在意考證是否信實，他之書寫目的亦不在考證。但他的巧思精構，卻引起了章衣萍等後來研究者的關注，不自覺地導引出「愛情悲劇」的研究新方向。章衣萍〈黃仲則評傳〉借用郁達夫的文學創作進行學術研究，情史成為他評傳書寫的一個突破點，使這種史傳書寫，轉向文學書寫靠攏，演示一種抒情性傳記的寫法，衝擊了評傳的既有寫作範圍。而從章衣萍評傳的影響來看，他成功了，我們看到二、三十代研究黃仲則的文章，幾乎都不能繞過戀愛故事的考索，或（及）其對詩風形成的影響。更有趣的是，不少研究都動搖了傳統的文體規範，例如將文學語言引入學術文章（郁達夫、邱竹師、陶愚川）、把愛情悲劇寫進年譜（邱竹師、黃逸之）、混合使用詩與詞來進行論證（邱竹師、金民天）等，這一切，都為了抒情。

這一切都為了抒情。為了發掘悱惻旖旎的情事，為了證實戀愛對人生的重要，為了肯定綺艷詩歌在文學的地位，也為了書寫一個有血有肉、符合現代文學欣賞標準的窮愁天才黃仲則，執筆者各顯神通，摒除定見，諸種體裁（小說、論文、傳記、年譜）、言語（文學性的、論述性的），自由地為他們所用。這種突破「文的形式」的書寫風氣，與文學革命後，文學界對文學形式的反思，單軌雙層地前行。所以，胡適對情感和思想的強調、對傳統文學僵化形式的唾棄，他與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就情緒和格律之關係展開的討論，都是黃仲則研究熱潮的文學理論背

---

<sup>72</sup> 胡適：〈談新詩〉，原載《星期評論》第5號（1919年10月10日）。亦載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頁295。

景。所以，有關黃仲則的書寫在當時，並不純為古典文學研究，還是呼應著時代脈搏，富有現代意義的書寫。如果以此邏輯觀照民國時期的古典文學研究，會發現同道者實在不少，例如聞一多〈杜甫〉刻意撇開考證，運用豐富想像力結構詩人情感、詩歌與身世行誼<sup>73</sup>，梁宗岱的〈屈原〉以詩人情感反應來論斷〈九歌〉確為屈原所作等<sup>74</sup>，都可作為佐證。只是，這時期黃仲則研究之將愛情放大，尤其亮眼；愛情並非抒情之全部，但卻是私密的、可以撇除政治元素的一種抒情向度；其與中國文學傳統之「抒情言志」構成張力，演示一種純粹的、張揚個性的文學研究新路向。這種釋解風氣蘊釀於五四、勃發於二、三十年代，正合時宜。

黃仲則詩在民國，經過古代文學的「現代演繹」，化成一個抒情載體，承載著二、三十年代文人對人生、愛情、文學的思考。本文要說明的，並不是黃仲則的真實面貌如何，而正正是這些對人生、愛情、文學的思考，如何通過書寫黃仲則而抒發出來。簡而言之，這種書寫也是一種抒情。最後，本文援引歌德（Goethe）《浮士德》〈獻詞〉中幾句詩作結，它曾被郁達夫在〈采石磯〉開首用德文引用：

Mein Leid ertoent der unbekannten Menge,

（我的悲哀現在詠給生疏的群眾諦聽，）

Ihr Beifall Selbst macht meinem Herzen bang:

（它們的讚賞反而會使我心驚的，）

Und was sich sonst an meinem Lied erfreuet,

（並且一切其它欣賞我的歌兒的友朋們）

Wenn es noch lebt, irrt in der Welt zerstreuet.

（縱然尚存在，卻已東西地世間離散。）<sup>75</sup>

<sup>73</sup> 聞一多：〈杜甫（未完）〉，載《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頁7-22。

<sup>74</sup> 梁宗岱：〈屈原〉，《梁宗岱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頁203-250。原稿作於1941年，為「第一屆詩人節」紀念屈原而撰。

<sup>75</sup> 這裡選用的是楊丙辰於1931年重譯〈獻詞〉的版本。楊丙辰：〈葛德所著『浮士德』一劇卷首獻詞〉，載《清華周刊》第35卷第4期（1931年），頁58；該文後來亦載《鞭策周刊》第2卷第7-8期（1932年），頁204。

黃仲則冥冥俯覽這些書寫，會覺得心驚呢，還是喜得知音呢？

## 徵引書目

### 一、書目

包世臣：《小倦遊閣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鈔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杜松柏主編：《清詩話訪佚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易宗夔：《新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1995年。

金民天：《黃仲則詩詞》，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第2版。

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袁枚撰，王英志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黃景仁撰，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黃景仁撰，翁方綱選：《悔存詩鈔》，四庫未收書輯刊拾輯，第2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黃葆樹、陳弼、章谷編：《黃仲則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魏仲佑：《黃景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7年。

### 二、期刊論文

不題撰人：〈「新月」的態度〉，《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頁3-10。

王澤龍：〈20年代中國現代詩歌音節詩學初探〉，《學習與探索》2004年第4



期，頁 97-102。

邱竹師：〈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新月》第 2 卷第 10 期（1929 年），頁 1-29。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 2 卷第 5 號（1917 年），頁 1-11。

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新月》第 1 卷第 1 期（1928 年），頁 114-144。

胡適：〈談新詩〉，原載《星期評論》第 5 號（1919 年 10 月 10 日）。

郁達夫：〈采石磯〉，《創造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23 年），頁 51-68。

徐景賢：〈徐光啓著述考略〉，《新月》第 1 卷第 8 期（1928 年），頁 56-69。

張文飛：〈關於黃景仁作品的版本〉，《社會科學家》2007 年 11 月增刊，頁 223-224。

陸樹枏：〈哀愁詩人黃仲則（1749-1983）〉，《江蘇研究》第 1 卷第 6 期（1935 年），頁 1-8。

陶愚川：〈一個涼風沉醉的深夜〉，《認識》1930 年第 3 期，頁 50-53。

陶愚川：〈論詩人黃仲則〉，《大夏期刊》1932 年第 3 期，頁 8-19。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下篇），《學林雜誌》卷 2 第 2 期（1925 年）頁 1-14。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上篇），《學林雜誌》卷 1 第 12 期（1925 年），頁 1-16。

楊丙辰：〈葛德所著『浮士德』一劇卷首獻詞〉，載《清華周刊》第 35 卷第 4 期（1931 年），頁 58。

聞一多：〈杜甫〉（未完篇），《新月》第 1 卷第 6 期（1928 年），頁 7-22。

歐陽予倩：〈潘金蓮〉，《新月》第 1 卷第 4 期（1928 年），頁 53-90。

謝憫生：〈詩人黃仲則的戀愛〉，《人間世》1935 年第 42 期，頁 22-23。

譚正璧：〈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跡考〉，《大眾》1945 年第 31 期，頁 90-94。

蘇雪林：〈愛國尚武的詩人陸放翁〉（未完），《新月》第 2 卷第 2 期（1929 年），頁 40-66。

蘇雪林：〈愛國尚武的詩人陸放翁〉（續），《新月》第 2 卷第 2 期（1929 年），頁 63-78。



饒孟侃：〈梧桐雨——元曲本事〉（未完），《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頁 59-74。

饒孟侃：〈梧桐雨——元曲本事〉（續），《新月》第1卷第7期（1928年），頁 77-86

饒孟侃：〈梧桐雨——元曲本事〉，《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頁 20-32。

# Lyric Tradition in Modern: The Reception of Huang Zhongze's Poems in Mingguo Period

*Yip, Cheuk-Wai*

Lecture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ong Kong

## Abstract

Huang Zhongze, a poet of Qing Dynasty, was being a hot topic in literary research in Mingguo period, especially in '20s to '30s of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views of several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and Mingguo period, describes the differences of those views, in regards to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writings by Yu Dafu and Zhang Yiping introduced a new direction of Huang Zhongze research which was followed by many researchers. 'Love story' became the focus of such researches. These writings are lyrical,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in literary style, forms and language. Moreover, they also responde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argued by literature research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literature revolution in May Fourth Movement.

**Keywords:** Huang Zhongze, Zhang Yiping, Love poems, Lyric tradition, Literature revolution

